

# 游走于权力网络中的灰色地带

## ——“孤岛”时期的《大美晚报》研究

王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1937年12月,《大美晚报》利用其美商身份和上海租界治外法权在“孤岛”掀起了“洋旗报”运动,成为上海抗战宣传的舆论先锋。全面抗战前,《大美晚报》鲜明的抗战立场化解了它与国民政府因新闻报道而产生的矛盾,并因国民政府开始意识到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而使其受到重视。但与此同时,《大美晚报》也成为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的眼中钉。通过发掘和利用新史料,本文旨在探讨《大美晚报》如何因应日伪政权、上海租界当局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构成的三方权力网络。基于《大美晚报》的历史叙述,本文试图展现新闻业与国民政府之间在“孤岛”形成更为紧密纽带关系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促使国民政府强化其对于新闻业的主导权。

**【关键词】**《大美晚报》; 上海孤岛; 新闻业; 国民政府; 高尔德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上海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下的“孤岛”,租界内新闻业成为租界和日本当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大道及汪精卫伪政权等众多政治势力争相拉拢和压制的对象。由此,新闻业与多方政治力量之间形成了拉锯与博弈。1941年,斯坦纳(H. Arthur Steiner)认为日本与其扶植的通敌政权试图通过实施暴力活动影响新闻业的效果非常有限(Steiner, 1941: 141)。然而,之后的相关研究却对这一论断提出质疑。傅葆石(Poshek Fu)发现,对绝大多数生活在“孤岛”的上海民众,尤其是那些知识精英阶层而言,他们的立场和行为方式是暧昧多变的(Fu, 1993: xiv)。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也指出,日本占领区内,绝大多数人处于抵抗和通敌之间含混不清的“灰色地带”中,这一点在上海“孤岛”尤为明显,以至于抵抗活动被残酷且带有暧昧的手段压制下来(Wakeman, 1996: I)。

“孤岛”时期的新闻史研究虽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史料和视角的局限,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新闻机构与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之间的合作或对抗,并将其归类为积极宣传抗

战或沦为伪政权帮凶两类。这一状况在《大美晚报》<sup>[1]</sup>的相关研究上体现尤为明显，具体表现在研究视角依然局限在其抗战立场以及由此导致的众多报馆员工的牺牲。<sup>[2]</sup>本文希望通过发掘和利用新史料，突破这种局限，相对完整地呈现《大美晚报》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日本及其扶植的伪政权、租界当局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探讨国民政府与伪政权如何广泛地介入“孤岛”新闻界，借此展开舆论争夺，以及这场争夺中“孤岛”新闻界以何种方式被裹挟到权力网络之中，而国民政府又是如何利用时局对全面抗战前无法触及的租界新闻业施加影响。

## 一、从冲突到合作：“《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关系的转变

全面抗战前，《大美晚报》曾因新闻报道问题与国民政府发生过多冲突，其中比较激烈的一次发生在1933年夏天。这一年7月19日，《大美晚报》英文版依据伊罗生（Harold Isaacs）及其主编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提供的消息，在头版刊登了蒋介石密令“蓝衣社”暗杀55位政敌的名单，触怒了国民党当局。然而当时国民政府想要控制像《大美晚报》这种在上海租界内且有外商身份的报纸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Taylor, 103）。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上海租界没有司法和行政管辖权，它只得求助于美国驻华机构。最终，美国驻沪领事馆在与《大美晚报》的协商中，提出希望报纸以更加周全谨慎的态度来应对新闻素材（台北“国史馆”1, 1933）。

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外宣传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这成为《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关系得以改善的契机。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加快了设立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同年11月6日，在军事委员会宣传部内增设了国际宣传处。次年2月，该处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下辖部门。董显光作为中宣部副部长，负责该处的日常工作，曾在上海《大晚报》有长期新闻从业经验的曾虚白被任命为处长，协助董显光的工作（武燕军，1990：118）。董显光曾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留学，回国后长期为西方在华媒体，特别是上海租界内的英文媒体工作。这些经历最终促使他把西方在华媒体的舆论力量与蒋介石抗日的目标结合到一起（Wei Shuge, 2014：120）。

国际宣传处成立后的首要目标是加强对美国的宣传，再进一步扩展到争取世界上其他英语国家的舆论支持（Tong, 2005：74-75）。要完成这项任务首先要争取上海租界内的舆论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英美背景的报纸的支持。董显光认为，上海的外国报人，特别是来自英语国家的报人，对于中日之间战争的看法会影响到他们各自国家，甚至国际社会的舆论。然而，当董显光和曾虚白来到上海后便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他们发现日本已经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众多具有外商背景的报纸言论，同时工部局也越来越迁就日本的诉求。英商《字林西报》因具有工部局的背景，在处理涉日言论时越发谨慎。此时租界的英文报纸中，只有《大美晚报》和《密勒氏评论报》依然态度鲜明地批评日本

侵略，坚定地支持中国抗战（董显光，2014：119-120）。至此，《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开始了良性互动。

随后，董显光成为了《大美晚报》与蒋介石政府沟通的桥梁。由于其留美经历和媒体从业经验，他选择了与当时盛行的苏联式大众宣传不同的社会精英式宣传。在工作中，他充分利用私人关系，并提出事实是最好的宣传素材。鉴于西方民众对官方信息具有天然的抵触，他强调官方消息来源保密的重要性，通过淡化政府与消息来源的关联提高信息接受度（Wei Shuge, 2017：187）。董显光的工作风格获得了《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Randall Gould）这样的美国职业记者的认可，双方在往来中增强了私人互信。高尔德对董显光有良好印象，并称赞他友好、睿智且开明（Gould, 1946：332-333）。

1940年3月，高尔德到访重庆，董显光积极促成了他对蒋介石的采访。董显光向蒋介石强调《大美晚报》是上海最有影响力且同情中国抗战的外商报纸，建议其安排时间接受高尔德的采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40）。在受访中，蒋介石高度称赞《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他说《大美晚报》坚守立场，在新闻报道中不畏强暴，为此陷入空前困境，他本人已感受到这股捍卫新闻的勇气（Gould, 1941：31）。《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及其扶植的伪政权之间产生激烈冲突，这不仅影响了《大美晚报》在“孤岛”的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它随后的发展轨迹。

## 二、租界权力式微与《大美晚报》的因应策略

### （一）《大美晚报》掀起“洋旗报”风潮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鉴于日益严峻的国际局势，决定加强对消息和舆论的管控，遂于次年3月初在上海南京路大陆商场306号设立新闻检查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2006：31）。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撤出上海后，日本接管新闻检查所，并将其搬至南京路的哈同大楼（上海市档案馆，1986：862）。同时，日本对租界当局施压，迫使其禁止抗日活动。11月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致函上海工部局总董樊克令（C. S. Franklin），要求租界采取适当行动阻止小册子、传单、印刷品等印有反日内容的材料传阅。当月20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原田熊吉亲赴上海，与工部局总裁费信悖（Stirling Fessenden）交涉，要求租界取缔辖区内的抗日活动（马光仁，2014：822）。

随后，工部局召集上海各报馆开会。高尔德从中获悉，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迫于日方压力打算在报纸审查方面做出妥协。此时，英文报纸仍免于审查，但中文报纸需谨慎应对。租界当局特别强调，日本已经控制了租界以外地区，宣传抗日的出版活动难免激化与日本的矛盾，可能加快其进入租界直接接管报纸（Gould, 1946：318）。1937年12月

中旬，日本明确要求租界内中文报纸必须接受新闻检查。对此，《大美晚报》所有人史带（C. V. Starr）于当月16日发表声明，表示拒绝接受检查。史带称，《大美晚报》英文版与中文版同属一家美国公司，拒绝接受任何新闻检查，并强调报纸将努力坚守言论自由表达，无畏且强有力的评论，非党派风格（大美晚报，1937）。这一举动启发了留在“孤岛”的中国报人，他们为避免新闻检查，纷纷利用租界的中立政策和治外法权，将报纸冠以外商经营，确保抗日言论免于送检。随后，租界掀起了创办“洋旗报”的风潮（马光仁，2014：830-831）。

## （二）南京大屠杀与《大美晚报》中英文版刊登的异同

“孤岛”时期，《大美晚报》英文版因获得了美国国际新闻社电讯稿件在上海的专用权，在新闻供稿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中文版也因此享有更多获取独家新闻的机会（胡道静，2002：116）。尽管史带声明报纸中英文版的编辑方针相同，但《大美晚报》中文版在新闻刊登方面承受着远比英文版更多的压力，在实际报道中相较英文版更为保守。就在史带声明期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开始浮出水面。

对“孤岛”报界而言，虽然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但1937年12月之后，已经很难获得南京的消息。南京战事期间，一些目击了日本侵略过程中实施残暴行为的西方记者曾发出过相关的零星报道。随着12月15日留守南京的最后5名记者被强制驱离，日本开始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进入。当时因日德同盟关系，南京城内的德国侨民在安全上尚有保障，因此，以拉贝（John Rabe）为代表的德国侨民开始借助国际救济委员会在安全区开展相关救援工作（笠原十九司，1992：6-7）。于是，国际救济委员会成为上海报界获取南京城内消息的主要来源。

《大美晚报》英文版是较早披露南京大屠杀的西方在华报纸之一。自1937年12月22日，《大美晚报》英文版连续三天刊登了日军占领南京后对平民施暴的新闻（经盛鸿，2011：217-218）。此后，《大美晚报》又从南京安全区内的西方人那里获取了关于南京局势的进一步消息。金陵大学历史学教授贝德士（Miner S. Bates）当时是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他曾给身在上海的夫人写信，让她将有关南京的材料转交给包括高德在内的在上海值得信任的西方人，以此希望日军在南京肆无忌惮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38）。从胡佛档案可知，高德确实收到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相关消息（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但这些消息并未在《大美晚报》中文版上刊登。只是1938年1月15日，中文版刊发了南京城内日军侵犯美国侨民财产，美方向日本提出抗议的消息（大美晚报，1938a）。

当时，“孤岛”内懂英文的社会精英时常可以从包括《大美晚报》英文版在内的英文报纸上获悉一些在中文报纸上难以读到的消息。著名报人胡道静回忆说，“孤岛”时

期他每天都会阅读各类外文报纸，从中获得一些关系个人安危的信息。1940年冬，他在《大美晚报》英文版上读到一则消息，称日军将会到虹口老靶子路与福生路区域巡逻。当时，胡道静就住在这一带，且家里藏有大量与抗日有关的书报资料。于是，他急忙在别处寻找租住房屋，并于第二天匆匆搬走（胡道静，2002：114-115）。

虽然《大美晚报》中文版在选取新闻方面与英文版有所不同，但它同样坚守抗日立场。上海沦陷后，“孤岛”内民族主义氛围空前高涨，对新闻格外渴求，因此，《大美晚报》中文版吸引了大批读者（陈存仁，2001：44；顾执中，1987：637）。此时租界当局不希望辖区内的报纸与其对日政策相抵触，因此《大美晚报》的言辞不可避免地与其租界当局发生冲突。

### （三）《大美晚报》应对“五月危机”

1939年春，租界当局屈从于日方不断加码的压力，根据日方要求采取取缔政治宣传活动，勒令抗日报纸停刊和实行新闻预审检查制度等一系列措施限制新闻言论自由，从而引发了“孤岛”新闻业的“五月危机”，“洋旗报”受到严重冲击（马光仁，2014：848-857）。1939年5月5日，工部局总巡向中文报纸发出公函，称若有报纸未经许可私自刊发新闻，不仅吊销其登记许可，还将实施进一步惩罚。对此，《大美晚报》中文版于5月6日头版刊登评论文章，称工部局在法理上无权对在上海的外国人所有的报纸进行新闻检查，并强调1937年12月16日报纸发表的拒检声明中提到的自由公正的核心价值从未改变，因此再次表明不接受工部局的新闻检查（大美晚报，1939a）。

租界当局试图在日本和抗日报刊之间寻找平衡的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它对“孤岛”新闻业的影响力。这一点在随后7月份劝说《大美晚报》不要刊登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稿中得以体现。1939年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前夕，工部局警务处走访了多家中文报馆，要求他们在7月6日至12日期间不要刊登有关纪念卢沟桥事变的文章。其中，警务处官员在7月1日和3日到访《大美晚报》，向高尔德传达上述要求。与其他中文报馆一样，高尔德爽快地表示，他会在这问题上尽最大努力与警务处合作。7月4日，法捕房总监法伯迩（L. Fabre）向高尔德发出正式信函，提醒他在新闻采编立场上要保持克制。工部局警务处包文（K. M. Bourne）处长5日致函法伯迩，称包括“洋旗报”在内的中文报纸都已悉数保证会遵守警务处的相关规定。然而，当这些承诺汇总上报给警务处特别部后，得到的批复是这些承诺并不可靠，并要求对报纸的实际言行有所关注（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

警务处对于高尔德的劝说并未凑效。7月7日，《大美晚报》中文版头版援引美联社重庆发来的消息刊登了蒋介石措辞严厉的抗日檄文。蒋介石在讲话中称“在內的方面，团结有如磐石之固，在外的方面，各国之同情，亦皆属于中国方面。凡此种种，皆足以证东亚各民族之公敌，必趋于败北之途”（大美晚报，1939b）。此外，当天报纸头版

还刊登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外交部长王宠惠、经济部长翁文灏为纪念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发表的各自抗战谈话。

### 三、以强硬立场对抗软硬兼施：《大美晚报》对日伪政权的反抗

#### （一）伪大道政权试图控制《大美晚报》

1937年12月5日，日本扶植的地方政权——“上海市大道政府”在浦东成立，苏锡文出任市长。次年，“大道政权”又开始各种筹划，试图诱导和控制上海，特别是租界内的舆论。3月14日，“大道政府”发出加强新闻检查的密令，要求严查涉及宣传赤化、抵触政府政策、破坏中日邦交的言论（上海市档案馆，1986：803）。

然而，上述政令难以在租界内实施。虽然“大道政府”无法容忍“孤岛”新闻界犀利的批判，但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压制。令其更为头疼的是很多报贩通过各种走私渠道，将包括《大美晚报》在内的抗日报纸偷运出租界贩卖。1938年3月19日，“大道政府”宣传股股长沈毅向苏锡文报告称，“查《文汇报》及《华美报》及《大美报》等三种报纸在浦东依法在禁售之列，但最近职查得有无耻奸商，居然违背法令，私将上项报纸秘密运来发售”，“以上情形，非但藐视法令抑且对于职股宣传工作进行，尤有不少阻碍。”（上海市档案馆，1986：804）这些运出租界的报纸，虽然售价较高，但仍被争相订购（顾执中，1985：384）。

此后，“大道政府”尝试通过间接方式软化《大美晚报》的态度。4月26日，沈毅向苏锡文提出，“大道政府”虽无法直接取缔租界内借外商名义创办的报刊，但可以通过创办新闻通讯社，影响他们的新闻立场（上海市档案馆，1986：805）。随后这一建议被采纳。6月4日，由沈毅亲任总经理的新文通讯社向苏锡文提交了5月下半月的工作报告，其中提到包括《新闻报》和《大美晚报》在内的18家报社每日使用新文通讯社稿件多达10~15篇。其中，以《大美晚报》为首的四家报纸刊登的稿件尤其多。鉴于当时“孤岛”特殊的舆论环境，为避免报人们怀疑新文通讯社有“大道政府”的背景，沈毅特别向苏锡文说明在十则新闻稿中，只掺杂两篇“大道政府”的宣传稿，这让报社在采用新文通讯社的稿件时不至于勉为其难（上海市档案馆，1986：807）。

尽管报告反映出《大美晚报》与新文通讯社有一些业务往来，但“大道政府”的这一方式并未改变《大美晚报》的新闻立场。当年11月4日，《大美晚报》中文版刊登《虹桥镇伪维信维持会苛税压榨平民》一文，嘲讽该机构贪赃敛财，卡车进出虹桥镇辖区一次还要支付两元的买路钱（大美晚报，1938b）。此文刊登后立即引来沪西虹桥镇自治会的不满，并以诽谤为由请求沪西区政务署向报社交涉（上海市档案馆1，1938）。

## （二）针对《大美晚报》的袭击浮现

这一时期，日本人尝试过通过暴力袭击压制《大美晚报》的言论。据高尔德回忆，一天清晨5点左右，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混进《大美晚报》馆，在二楼办公室门外放置了一枚手榴弹。当时一位报纸投递员正在门外木凳上睡觉，爆炸源就在木凳下，所幸这枚手榴弹成横向爆炸，投递员躲过一劫，但高尔德和英国专栏作家伍海德（H. G. W. Woodhead）的办公室已被炸得玻璃碎了一地。数天后，报馆再次遭遇爆炸袭击。同样清晨5点左右，有两人骑自行车到达报馆，将爆炸物丢到大楼旋转门外。随后，一名嫌犯被警察拘捕，审讯得知他们来自日本海军陆战队控制的苏州河北岸四川路，在这次行动中获得了50美元的报酬。几天后，高尔德从日本领事馆获悉，一个叫中村的日本军官招募了60多人，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袭击《大美晚报》馆的活动。对此，日本领事馆官员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高尔德意识到袭击行动原是一些日本军人的自作主张，他认为这种手段是徒劳的，并没有放在心上（Gould, 1946: 320-321）。

经历两次爆炸袭击后，1938年3月31日《大美晚报》又收到了一封3月26日寄出的疑似恐吓信。信封的寄信地址为“凤凤无线电广告公司”，信件中写信者称来自“春秋之道”这个组织，声称他们的道士精通堪舆术，预测《大美晚报》馆将于4月6日遭袭。起初，《大美晚报》编辑部和租界巡捕都信以为真，几天后查明这是一名南通10岁学生的恶作剧（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2）。总的来讲，“大道政府”时期，《大美晚报》并未遇到难以承受的压力，但随着汪精卫政权和其特务机构76号的成立，情形急转直下。此后，《大美晚报》才开始遭遇真正的麻烦。

## 四、妥协与退却：《大美晚报》应对汪伪政权中的微妙转变

### （一）76号整肃新闻业与《大美晚报》的接连遇袭

1939年5月，汪精卫在日本的秘密护送下来到上海，开始筹划建立伪政权。此后，汪精卫不断加强对宣传和新闻的检查。1939年11月15日，为压制“洋旗报”的舆论声势，上海特别市政府宣传委员会成立（上海市档案馆，1986：841）。1940年12月16日，汪精卫派专员从日本手中接收新闻检查所，之后又通知工部局予以配合。工部局表示因各种困难不能履行各报送检，但会全力制止租界内报纸发表不利言论（上海市档案馆，1986：862-863）。

然而，汪精卫控制新闻界的最有效手段并非新闻检查，而是利用特务机构直接实施恐怖活动。这给《大美晚报》带来了空前的压力。自此，“孤岛”内充满了血腥暴力，报人们在坚守新闻职业操守的同时不得不顾及个人安危。1939年初，原国民党中统出身的丁默村与李士群在土肥原贤二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

挥部”。同年5月，该组织在日本的斡旋下开始与汪精卫合作（马振犊、陆军，2017：56）。随后，特工总部在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正式成立。整肃“孤岛”舆论，控制新闻业成为76号的一项重要任务，不久便对报人展开了袭击活动（顾执中，1983：146）。

《大美晚报》对汪精卫通敌行为的谴责尤为激烈。1939年3月31日，高尔德以公开信的方式反驳“维新政府”上海市长傅筱庵向租界提出的包括制止租界内不法活动、恢复设在大西路的派出所、交换前土地局卷宗、收回第一特区法院、停止在租界内悬挂青天白日旗的五项要求。他讽刺说，即使工部局有与“维新政府”合作的可能，在外交上也绝对无法承认伪政权（中央日报，1939）。

《大美晚报》的激烈言辞很快引起了76号的注意。起初，丁默村尝试派人说服《大美晚报》，但结果适得其反（蔡德金、尚岳，1986：58）。随后，76号开始制造恐怖气氛，并施加暴力手段。76号首先要遏制《大美晚报》的发行与流通。1939年4月18日，《大美晚报》总报贩赵国栋惨遭暗杀（姚福申、叶翠娣、辛曙民，1983：164）。76号还试图收购市面上所有贩售的《大美晚报》阻止其流通，或者将过期报纸夹在当日报纸中贩卖，以破坏其声誉（姚福申、叶翠娣、辛曙民，1983：169）。

此后，76号还对报馆进行袭击，对报人施加恐吓。丁默村和李士群首先派吴世宝带人袭击《大美晚报》馆，不料他们找错了地方，袭击了《大美晚报》馆对面一侧的《中美日报》。然而，《大美晚报》的立场并未改变。于是丁默村和李士群命令夏仲明派第六行动大队队长潘公亚再度前往《大美晚报》馆，袭击其编辑部人员。由于缺乏内线，他们对报馆结构并不清楚，闯进后便失去了方向，结果进入排字间，打翻了设备，又打伤了几个印刷工人。当时，报馆外停有一辆法租界巡捕房保护报馆的装甲车，当车内巡捕听到报馆内响起枪声与爆炸声后拉响了警报。潘公亚见势不妙，便冲出报馆，在随后交火中，腿部中枪，最终和一名史姓特务被捕。后因巡捕慑于日本压力，二人都被日本宪兵队保了出来（蔡德金、尚岳，1986：58-59）。

《大美晚报》并未因这次袭击而退却。于是，76号开始对言论激烈的记者和编辑下手（蔡德金、尚岳，1986：59-60）。1939年6月，76号向各编辑发送了恐吓信，要求他们立即改变反汪立场，否则将面临死亡威胁。当时《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收到信后，直接将其刊登在《夜光》上，加以冷嘲热讽（顾执中，1986：94）。而此时正值76号准备对《大美晚报》编辑下手之际，他便成了暗杀的目标（蔡德金、尚岳，1986：60）。8月30日下午4时左右，朱惺公走出寓所后，遭三人拦截，头部中弹而亡（大美晚报，1939c）。之后不久，《夜光》悄悄改成了文学版，不再像以前那样刊登大量挖苦日本和汪精卫的评论。

与76号不同，日方对《大美晚报》和高尔德以拉拢为主。1940年6月23日，高尔德计划从上海乘飞机前往北平，但由于《大美晚报》的抗日立场，行程受阻。高尔德将此事

告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并提出抗议（Gould, 1946: 363）。随后，三浦义秋总领事向外务大臣有田八郎汇报，称高尔德作为《大美晚报》主编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特派记者，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日本多有言辞激烈的批判，但并不建议敌视他，而应通过与其保持接触，争取笼络他（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在三浦的努力下，最终高尔德的行程获准。事后高尔德很满意自己在这次争端中的表现，他认为面对日本的施压必须要强力回击，这是他在长崎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前就已领悟的道理（Gould, 1946: 363）。

## （二）生存危机中《大美晚报》的微妙转变与重庆国民政府的介入

1940年，《大美晚报》因汪精卫特务机构更加血腥残酷的恐怖手段而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同年7月3日，汪精卫公布了一份通缉上海83名中国人的名单，其中包括《大美晚报》的张似旭。公布名单后，其中一些人或横尸街头或莫名失踪。7月15日，南京行政院向上海市长傅筱庵发布了汪精卫签署的驱逐6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的命令，其中包括史带和高尔德。对此，高尔德和史带再一次以1937年12月16日发表的拒检宣言为基础重申立场（Gould, 1946: 323-324）。7月17日，《大美晚报》中文版头版发表社论，强调重庆国民政府是合法政府，而汪伪政权的驱逐令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并继续重申《大美晚报》将继续坚持言论表达自由，秉持犀利的评论与客观公正的立场，报纸不接受任何新闻检查（大美晚报，1940a）。

尽管此时《大美晚报》的态度与立场一如既往，但它所面对的形势与1937年底相比已经截然不同。“孤岛”内新闻业者频遭暗杀，报馆屡遭袭击，恐怖活动肆虐，报人报馆的安全无法得到保障。正如徐铸成所说，新闻业者的“孤岛”生活如同被关在紧闭的铁笼里，并且还要随时面对炸弹的威胁（徐铸成，1981: 301）。同时，汪为政权越来越依赖76号来维持，因此76号的权力不断膨胀，其行为也越来越难以受控（Brian Martin, 2001: 139）。此时，面对如此境遇，经常发表抗日言论的报人们，内心充满焦虑，有心坚守却又不得不顾及个人安危，从而陷入摇摆的“灰色地带”。正如金雄白称：“因为我是报论旧人，对于同业也就特别关心，不幸新闻界的朋友们却死得特别多”，“我也曾偷偷引若干地位较重要而与余关系较深的抗日记者与佛海见面，取得默契”，“那是留在上海的报馆重要人员，几无一不曾由我陪同与周见面的，这里我不想列出他们一向自以为忠贞者的姓名了”（金雄白，1988: 77）。

1940年7月19日下午，张似旭在静安寺路起士林餐厅遭遇两名枪手袭击，身中五枪，送到宏恩医院时已经不治身亡（大美晚报，1940b）。张似旭遇袭对《大美晚报》冲击很大。此后，他主管的《大美画报》很快陷入困境被迫停刊（赵修慧，2003, 58）。《大美晚报》管理层此时也萌生了出售报纸的念头。8月19日，三浦总领事向东京汇报称，高尔德已与李士群接洽，商谈出售《大美晚报》一事。高尔德打算将报纸中英文版一同出售，但李士群只想买中文版，对英文版并无兴趣。而高尔德则坚持中英文

版难以分割，必须一并出售，并开出205000美元的收购费，李士群对此难以接受（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正当双方讨价还价之际，《大美晚报》再遭厄运。

在三浦总领事向东京发报的当天上午，《大美晚报》中文版国际版编辑程振章离家准备前往报馆时遭遇枪击，随后被送往广慈医院抢救（大美晚报，1940c），但终因伤势严重于21日傍晚8时去世（大美晚报，1940d）。金雄白提起这次暗杀时不禁哀叹：“他是一个新进，决不应该是狙击的对象，甚至我从未听过他的名字，而竟然枉送一命”（金雄白，1988：77）。面对76号咄咄逼人的态势，租界当局不断妥协退让，而重庆国民政府则更为积极地介入上海新闻业。事发一周后，时任重庆国民政府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近日敌伪在沪租界，肆行截杀，威胁守正之人。新闻记者（如《大美晚报》之两记者及《新闻报》之记者）遇害之事。重见叠出。工部局亦慑于敌人威力，对报纸之同情于我者加重压迫。予因请外部密与英、美政府交涉”（林美莉，2012：291）。

此时，租界对“孤岛”新闻业的保护已经名存实亡，而国民政府在热情高涨的抗战氛围下，获得了利用经济手段介入上海新闻业的机会。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设有与新闻出版业联络的办事处，由徐蔚南负责。全面抗战前，他曾在柳亚子主持的上海通志馆担任编辑主任（胡道静，2001：15-16），1935年赴南京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的主任秘书。抗战爆发后，随国民政府西迁至武汉（胡道静，2001：24-25），后随着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从武汉调回上海，开始负责与支持重庆的新闻机构联络，并提供资金帮助。据曾在上海通志馆与他共事的胡道静回忆，由于国民政府上海办事机构为“孤岛”内抗日报刊提供经济支持，所以这些报刊并没有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此外，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还在“孤岛”成立地下通讯社，即中正论社。该社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成员分头写稿，最后汇总到徐蔚南手中，由他交给各报馆刊登（胡道静，2002：116）。

当重庆国民政府获知《大美晚报》有意出售的消息后，认为它是上海对抗日本与汪精卫政权的重要舆论阵地，应全力挽留。1940年9月1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美人所办《大美报》（英文）及《大美晚报》（华文），反对敌伪甚力。近来迭受敌伪威胁，有停办及出售信息。予于今日特电沪设法劝阻，并拟津助之。（林美莉，2012：295）”此前日本一直怀疑《大美晚报》受到重庆国民政府的资助。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统局截获了一封日本从上海发往东京的密电称：“据闻，《大美晚报》主笔前在汉口接受蒋介石及宋美龄相当数目之津贴，又上月底接受宋子文致送之反对维新政府宣传费五万元。本月初以来，该新闻连日所载之新闻及论说，均为恶辣之排日论调”（台北“国史馆”2，1938）。不过高尔德对此予以了否认。1940年他对日本领事馆表示本人未收取重庆的任何资助，《大美晚报》所有员工均未有此行为（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

尽管《大美晚报》此后仍然继续坚守“孤岛”，但暂时离开成为很多人不得不考虑的选择。《大美晚报》编辑袁伦仁便在重压之下决定离开。据高尔德回忆，一天，一位76号特务走进《大美晚报》馆新闻编辑室，同袁伦仁坐下来交谈。特务罗列了袁伦仁过去4天在上海的活动行踪，并开出条件，如果他愿意留在《大美晚报》作内线，将得到数倍于目前收入的酬金。袁伦仁意识到已经被跟踪监视，他并未屈从，但慑于76号的威胁，他很快从上海逃离到香港，之后发现香港也不安全，便到了马尼拉，隐姓埋名，直到战争结束（Gould, 1946: 326）。

此时，随着日本和汪伪政权日益紧逼的态势加之租界的无力应对，史带和高尔德的行为和立场也有所改变。此时，高尔德对三浦总领事表示，《大美晚报》不得不做出相应调整，他本人也打算把工作中心从《大美晚报》转移到《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此外，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袭击，《大美晚报》馆已经壁垒森严。据当时到上海拜访高尔德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美国记者回忆，当时高尔德的处境十分危险，为防袭击，报馆大楼入口周围堆满了沙袋（MacKinnon & Friesen, 1987: 56）。此外，高尔德也随身配备手枪以防不测（董显光, 2014: 120）。

1940年8月，史带收到了来自法租界警察的警告，说他们得到情报，史带有可能遭受恐怖袭击。虽然后来针对史带的袭击并未发生，但他还是于1940年9月和高尔德离开上海，启程返回美国（U.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3）。之后，奥珀（F. B. Opper）接手《大美晚报》（Gould, 1946: 323）。但76号并没有就此收手，《大美晚报》制版房主任朱长海被刺重伤之后，副经理、广告部主任李骏英也于1941年6月23日中午12时左右，在行至报馆附近的外滩时，遇袭身亡（大美晚报, 1941）。报馆员工接连不断遭遇暗杀，牺牲员工的亲属纷纷向重庆国民政府申请抚恤和嘉奖，客观上为重庆国民政府介入上海新闻业提供了社会诉求。6月28日李俊耀得知堂弟李骏英牺牲的消息，第二天便向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提交申请，希望念死者忠烈给予褒恤。7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给予家属一次性抚恤金两万元，并致函国民政府对李骏英明令嘉奖。7月31日，国民政府正式发布通令褒扬（台北“国史馆”5, 1941）。

1941年12月7日，《大美晚报》出版了在“孤岛”的最后一期。第二天，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日本随即对英美宣战，占领上海租界。《大美晚报》馆被全面接管（Gould, 1946: 337）。战时重庆对于新闻出版实施严格限制和审查，根据国民政府规定，所有拥有外商背景的报纸均不得在重庆出版。但《大美晚报》因在“孤岛”反击日本和汪伪政权的特殊贡献和牺牲于1943年10月特例获准在重庆复刊。重庆方面对《大美晚报》的出版活动严格限制，只允许出版英文周报（重庆市档案馆, 1943）。此外，《大美晚报》还要接受美国军方的内容审查的同时，忍受国民政府严苛的新闻检查。最终《大美晚报》因不满重庆的新闻检查，在抗战胜利前夕宣布停刊，寄希望在战后的上海获得更好的新闻出版环境。1945年9月，拒检运动爆发，进一步促使史带和高尔德决

心到上海复刊。但是，他们的愿望很快破灭，《大美晚报》在战后依旧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严格的检查，长期陷入萧条，于1949年6月14日最终停刊。

## 五、结语

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新闻业依靠租界获得的政治上的相对独立和依靠市场运作坚持的职业操守逐渐改变。淞沪会战后，租界当局虽然依然拥有行政管辖权，但在日本和伪政权咄咄逼人的态势下，不得不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出台了一些限制其辖区内报纸发表抗日立场的政策。从《大美晚报》的应对看，这些政策的作用有限，租界对报纸的影响越来越边缘化，其权威不断遭到挑战并逐步瓦解。而“孤岛”新闻业也逐步陷入到日本和其扶植的伪政权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之间的权力网络中。“孤岛”初期，《大美晚报》坚持抗战立场，言辞激励，客观上契合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重视外交的目标，缓和了战前双方的冲突关系。同时，以《大美晚报》为代表掀起的“洋旗报”运动却进一步激化了报界与日本及伪大道政府之间的矛盾。苏锡文的伪大道政府和日本军事机构软硬兼施，试图压制《大美晚报》的批评声浪，却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

上述形势随着1939年汪精卫的特务机关76号的成立出现了微妙改变。汪精卫组建伪政权后，高度依赖76号，通过残酷血腥的恐怖活动和暗杀手段相当程度上压制了以《大美晚报》为代表的“孤岛”报界对于汪精卫伪政权的舆论挞伐。《大美晚报》此时陷入到魏斐德和傅葆石所描述的“灰色地带”，报纸的言论和报人的行为都在压力重重之下发生了微妙变化。对此，古厓忠夫认为“孤岛”时期上海地方精英和市民对日本采取了一种不合作抵抗。他们尽力维持租界的独立性，一方面避免公开的抗日活动，另一方面，处于对地域生产生活负责的使命感，形成并保持抗日网络（古厓忠夫，2000：490）。然而，从《大美晚报》在伪大道政权到76号成立这一过程中的言论及行为变化来看，抵抗意志与所面临的压力之间此消彼长，其中来自伪政权的压力明显高过日本。马丁（Brian Martin）认为，76号的存在使汪伪政权的外部威胁得以缓解，但也因此打破了伪政权内部的平衡，给伪政权的安全带来了新的致命挑战（Martin，2001：140）。对于《大美晚报》而言，正是因为这种压力客观上让它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逐渐形成更加紧密的联系。这种结果既不是76号想见的，也不是它能改变的。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紧密联系，《大美晚报》得以在“孤岛”结束后获准在重庆复刊，不得不陷入国民政府的权力网络中，开始经历与全面抗战前的上海截然不同的新闻出版环境。而这正是抗战爆发后新闻业社会角色转变过程的写照和缩影。

此外，“孤岛”时期也成了中国新闻业发展的重要转折。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国民党在长江下游建立的权力中心被迫西迁，东南沿海的都市文化也随之向全国扩散（Hung Chang-tai，1994：1-3）。对新闻业而言，这不仅仅是一场地理上的迁徙。东南沿海，

特别是租界内的媒体，在这场文化迁徙中不可避免地会与国民政府发生勾连。抗战爆发后，经济资本对于上海新闻业支配力逐步减弱，进一步为国家权力垄断新闻业提供了关键契机（Chin Sei-jeong, 2003: 3）。此外，从“孤岛”时期《大美晚报》的发展历程来看，全面抗战前形成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却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长江下游建立起来的权力中心虽被摧毁，但却给他带来了控制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租界报业的机会。这个过程中，租界力量不断式微，上海报业的相对独立性逐渐瓦解，在日伪当局残酷暴力的压制下，却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形成更紧密的联系。国民政府在强化战时舆论动员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上海新闻业的渗透与控制。

---

#### 注释:

- [1] 《大美晚报》英文版于1929年4月创立。1933年1月16日开办中文版。1941年12月8日，日军进入上海租界致使报纸停刊。此后，《大美晚报》虽在陪都重庆和战后上海获准复刊，但中文版却未能出版。
- [2] 现有关于《大美晚报》在“孤岛”时期的历史叙述，参阅黄瑚. 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J]. 新闻研究资料, 1987(3);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马光仁主编. 上海新闻史(1850-1949) 修订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王欣. 一份颇具影响的外商华文晚报——《大美晚报》[J]. 新闻研究资料, 1991(3).

#### 参考文献:

- [1] Steiner, H. A. "American-Japanese Tensions in Shanghai."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15.1 (1941):140-146.
- [2] Fu, P.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3] Wakeman, F. *The Shanghai Badlands: Wartime Terrorism and Urban Crime, 1937-19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6.
- [5] 马光仁主编. 上海新闻史(1850-1949) 修订版[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 [6] 黄瑚. 上海“孤岛”时期抗日报刊述评[J]. 新闻研究资料, 1987(3), 第95-130页.
- [7] 王欣. 一份颇具影响的外商华文晚报——《大美晚报》[J]. 新闻研究资料, 1991(3), 第145-156页.
- [8] Taylor, J.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9] 台北“国史馆”3. 吴铁城电蒋中正关于大美晚报捏载蓝衣社新闻案美总领事已伤该报更正并再尊示密查来源严究(1933年7月31日)[Z], 档号: “蒋中正总统文物” 002-080200-00111-019.
- [10] 武燕军. 抗战时期的国际宣传处[J]. 民国档案, 1990(2), 第118-122页.
- [11] Wei, S. "News as a Weapon: Hollington Tong and the Guomindang Centralised Foreign Propaganda System, 1937-1938."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9.2 (2014): 118-148.
- [12] Tong, H. *Chiang Kai-shek's Teacher and Ambassador: An Inside View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rom 1911-1958; General Stillwell and American Policy Change Towards Free China*. Bloomington, Indiana: Author House, 2005.
- [13] 董显光. 董显光自传: 报人、外交家与传道者的传奇[M]. 台北: 独立作家出版社, 2014.
- [14] Wei, S. *News under Fire: China's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in the English-Language Press, 1928-194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7.
- [15] Gould, R. *China in the Sun*.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Inc., 1946.

- [1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际新闻处董显光致蒋中正(1940年3月5日)[Z]. 档号:七一八(5)-82.
- [17] Gould, R. *Chungking Today*. Shanghai: The Mercury Press, 1941.
- [1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汪伪上海新闻检查所工作报告[J]. 民国档案, 2006(1), 第31-33页.
- [19] 上海市档案馆. 日伪上海市政府[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6.
- [20] 责任声明启示[N]. 大美晚报, 1937-12-16(1).
- [21] 胡道静. 上海孤岛生活的回忆[J]. 史林, 2002(4), 第107-117页.
- [22] [日]笠原十九司. 解説[A]. 南京事件調査研究会. 南京事件資料集1: アメリカ関係資料編[C]. 東京:青木書店, 1992年.
- [23] 经盛鸿. 西方记者笔下的南京大屠杀(上卷)[M]. 台北:新锐文创出版社, 2011.
- [24]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Jan. 21, 1938 My dear Wife: Letter from Bates to LB from Nanking, Yale Divin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Record Group No. 11, Box 1 Folder 8, NMP 0039.
- [25]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The Occupation of Nanking: Two Accounts by Eye-witnesses, collected in Randall Chase Gould papers, Box 4.
- [26] 南京美侨财产时受日军侵害[N]. 大美晚报, 1938a-01-15(1).
- [27] 陈存仁. 抗战时代生活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28] 顾执中. 报人生涯: 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自述[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 [29] 工部局与报纸[N]. 大美晚报, 1939a-05-06(1).
- [30]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1. Control of Chinese Press on July 7th Anniversary 1939,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9300/2.
- [31] 蒋委员长昨日发表告日本民众书, 中国现立于强国基础上, 民族公敌必趋败北之途[N]. 大美晚报, 1939b-07-07(1).
- [32] 上海市档案馆编. 日伪上海市政府[M].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6.
- [33] 顾执中. 战斗的新闻记者[M].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85.
- [34] 虹桥镇伪维持会苛税压榨平民[N]. 大美晚报, 1938b-11-04(4).
- [35] 上海市档案馆. 呈为呈报本月四日大美大英两报诽谤属会名誉事缘(1938年11月7日)[Z]. 档号:R18-1-216.
- [36]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2. "Ta Mei Wan Pao" Receives a Strange Letter, D8298/43.
- [37] 马振犊, 陆军. 76号特工总部: 抗战期间汪伪特务的组织与活动[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17.
- [38] 顾执中. 上海沦陷后敌人残杀报人的罪行[J]. 新闻研究资料, 1983(3), 第146-155页.
- [39] 沪大美晚报主笔致傅迪的公开信[N]. 中央日报, 1939-04-04(3).
- [40] 蔡德金, 尚岳编. 魔窟. 汪伪特工总部七十六号[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41] 姚福申, 叶翠娣, 辛曙民. 汪伪新闻界大事记(上)[J]. 新闻研究资料, 1983(3), 第163-198页.
- [42] 顾执中. 报海杂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 [43] 朱愷公遗体定明日下午大殓[N]. 大美晚报, 1939c-08-31(1).
- [44]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1. 外国新聞記者、通信員關係雜件 / 米国人ノ部第二卷.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0974000.
- [45] 政策声明[N]. 大美晚报, 1940a-07-17(1).
- [46] 徐铸成. 报海旧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 [47] Martin, B. G. "Shield of Collaboration: The Wang Jingwei Regime's Security Service, 1939-1945."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16.4 (2001):89-148.
- [48] 金雄白. 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M]. 台北:李敖出版社, 1988.
- [49] 大美印刷公司董事张似旭昨日遇害, 定廿三日大殓[N]. 大美晚报, 1940b-07-20(1).
- [50] 赵修慧. 一份在洋招牌掩护下的抗日画报[J]. 世纪, 2003(3), 第57-58页.
- [51]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2. 外国新聞、雜誌ニ関スル調査雜件第四卷.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B02031048300.
- [52] 本报编辑程振章君今晨遭暴徒狙击[N]. 大美晚报, 1940c-08-19(1).
- [53] 程振章先生赴告[N]. 大美晚报, 1940d-08-22(4).
- [54] 林美莉校订. 王世杰日记[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社, 2012.
- [55] 胡道静. 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J]. 史林, 2001(4), 第15-26页.
- [56] 台北“国史馆”2. 毛庆祥呈蒋中正大美晚报主笔接受津贴宣传反对维新政府等日电译文情报日报表(1938年4月11日)[Z]. 档号:“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80200-00506-042.
- [57] Mackinnon, S. R. and Friesen, O.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 [58] U. S.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3. Threat of Life of Mr. C.V. Starr, Managing Director of Post-Mercury Co.,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367C.
- [59] 本报广告部主任李骏英昨午殉难[N]. 大美晚报, 1941-06-24(4).
- [60] 台北“国史馆”3. 褒扬李骏英(1941年7月31日)[Z]. 档号:“行政院”档案014000011628A.
- [61] 重庆市档案馆. 关于大美晚报周刊登记申请书准予登记的表, 指令, 函, 附申请(1943年11月3日)[Z]. 档号:0053-0023-00022.
- [62] [日]古坂忠夫. 日中戦争末期の上海社会と地域エリート[A].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編. 上海:重層するネットワーク[C]. 東京:汲古書院, 2000.
- [63] Hung, C. T. *War and Popular Culture: Resistance in Modern China,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64] Chin, S. J.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Newspaper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Shanghai Newspaper Industry, 1937-1953." *China Review* 13.2 (2003):1-34.